

防疫如查案 公衛的福爾摩斯



陳國東 36.08.02

海軍 少校

現職：成功大學內科、流行病學副教授

學歷：國防醫學院生命科學研究博士

卅餘年的行醫生涯，逾三分之二的時間，成功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研究所副教授陳國東選擇當臺灣公衛的「福爾摩斯」。陳國東說，走在病床的前面，有效控制疫情，救更多的人，這些，遠比當醫生享名得利，來得有成就感。

國內公共衛生領域中，論專業，論行政，資歷都相當完整的陳國東，出身國防醫學院六十六期。雖是軍醫，卻成功地將臨床所學，與流行病學結合在一起，成為國內公共衛生領域的先鋒者之一。

近二十年來國內發生的大小流行疫病，舉凡醫院院內感染瘧疾、大陸偷渡客集體罹患腳氣病、菲勞驅蟲劑過量致死、禽流感、SARS等等，陳國東無役不與，但憑藉著專業知識、臨床經驗以及冷靜思考及判斷，跳脫成見，結果答案往往是出人意料之外，也因此總能屢屢「破案」，消除國人心中疑慮。

陳國東是桃園人，家中有七位兄弟姐妹，食指浩繁，家境並不算富裕。雖然那個年代流行「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但最終仍選擇國醫，他說，這要感謝國軍重視教育，軍中教育制度規劃良善，教育、生活都兼顧，確實給了很多協助，「再也不用擔心繳不出學費，又可減輕父母負擔，那真是最無憂無慮的時期。」

民國六十一年，陳國東畢業於國防醫學院，陸續派駐左營陸戰隊醫院、海軍台中醫院、士林情報局（雨聲）醫院服務，以少校官階辦理退役，轉進私立中山醫院任職。陳國東說，他相當感謝陸戰隊醫院的院長，院長並非軍醫出身，但很照顧他，一直鼓勵他去三總進修，「當醫生是一輩子的事，不要怕延長服役。」只是當時還年輕，沒接受院長的好意。



▲民國五十六年就讀國防醫學院。

臨床學醫 不能怕累

陳國東說，這段「南征北討」的臨床醫師經驗累積，真的相當紮實。他說，那個年代，國內醫學的養成，流行「全科」醫師，畢業後又由軍方分派，所以那時他一年外科，一年婦科，後來就一直待在內科，因此即便到了住院醫師位階，還是沒有專科專長。但他永遠記得老師前輩的告誡，「年輕人，加減做，加減學，以後會有用。」



▲ 民國六十一年三總實習—與前署立台中醫院眼科主任張達權（右）合影。



▲ 帶北投精神病院病患到郊外踏青。

當時中山醫院裡有很多國醫出身的老師和學長，例如婦科的陳福民（國醫五十五期）、神經外科的沈力揚（國醫五十二期）等，很多主治醫師開刀時，都會找陳國東去幫忙拉鉤，「因為這個工作，不論時間長短，即便是長達二十三小時的刀，也都只有二百元薪水可領，所以很多人沒有意願。」但他認為，有這種訓練很不錯。

陳國東說，現在回想起來，這樣的臨床歷練是對的，多看多學，一點都不吃虧。記得在中山醫院時曾有一位同事，本有習慣性下

巴脫白，有一天他到手術房幫忙上刀，結果這位同事下巴掉下來了，一群人手忙腳亂不知如何是好。

當下他想起曾看過老師把病人脫白的下巴裝回去，看起來很容易，於是趕鴨子上架，但還是緊張到跟同事說「不要咬我喔。」旁邊的同事們全部笑翻，「已經都脫白了，怎麼咬人呀？」

陳國東認為，在中山醫院任職期間，真的受益匪淺。因為醫生開刀，往往一站就是逾十個小時，是很累，但不能怕累，撐下去，經驗就是自己的，所以他鼓勵現在的年輕醫生，有學習機會就要好好把握，不要說不是自己的領域就不學，通通學起來，將來都會有用處的，「功夫學得紮實，日後就無往不利。」

從臨床到公共衛生 腳踏實地挑戰無所不在的危機

陳國東說，當了十年醫生，退役之後，自覺太久沒有讀書進修，「面目可憎」，所以決定進修充電，考上了台大公共衛生研究所，打算畢業後再回來當臨床醫師。但陳國東的人生，卻在這裡轉了彎，接下來的這個「人生」裡，台大公衛研究院前院長林瑞雄教授引領他走進公衛領域，國內環境及職業病學專家柯源卿教授，則教導他紮根做學問的態度。

陳國東說，流行病學和臨床不同的是，危機永遠發生在你想不到的地方。雖然不脫傳染病、食物中毒、環境因素等範疇，但最主要的是成因千奇百怪，一路查探下來，總有出乎意料之外的答案。陳國東認為，只要掌握好人時地三要素，緊扣三原則，找出各個病例的共通點，而且每一環節都務必要做到「腳踏實地」，最後總是可以水落石出。

讓陳國東印象最深的是，柯源卿教授帶領他們調查一起菲勞因為吃了打蟲藥而罹患史蒂芬強森症候群，導致二人脫皮嚴重致死的案例。這起事件險些釀成國際糾紛，誤以為臺灣工廠虐待外



▲ 民國八十年耶魯大學傳染病專家 Dr. Evan（中）來台訓練授課合影，左起吳昭新所長、林邱鳳英（林瑞雄教授之妻）、林瑞雄教授、陳國東。



▲菲律賓衛生部長Dr. Dayrit（右四）率團來台與我方共同調查菲勞致死案，左四為張鴻仁副署長，左一為陳國東。

勞，菲律賓衛生部副部長還特地來台了解，還好當時已經完成調查，有資料可說明，原來是因為用藥劑量太大，以及菲勞體質對藥物過敏所致，誤會冰釋，這才保住臺灣的國際聲譽。

柯源卿教授在事件之後投書說分明。但就在投書後不久，有天柯教授突然說，華映公司工廠也有同樣的案例發生，要他們去調查，因為萬一不是，投書才剛刊出，那就糗大了。不過，當時公司並不配合，在榮總的病例也拿不到，回報後柯教授當場翻臉，隔天柯教授就拿到榮總的病例，展開調查。

陳國東說，這些事，讓他體認到，老師要教他們的是，做公衛要腳踏實地，不可以打馬虎眼，沒有就算了的隨便心態。而這個態度，也讓他做起學問來，更加得心應手。

跨界轉往公部門 造福更多人

就在台大公衛所畢業前，林瑞雄教授問他畢業後要做什麼？聽到陳國東打算重回老本行，只說，「幹嘛白白浪費時間？還不如留在公衛系統裡好好努力？」陳國東以為老師只是開開玩笑，沒想到老師起而就行。

當時的衛生署長是施純仁，也是國醫的師資群之一，林瑞雄

教授親自帶著陳國東去拜會施署長。

時值衛生署預防醫學研究所打算與美國疾病管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合作，開國內風氣之先，成立「應用流行病學專業人員訓練班」（Field Epidemiology Training Program, FETP），這個計畫（EIS）經費一案四年，由美方派遣顧問擔任計畫主持人，臺灣也需要一位主持人。所以施純仁署長在徵求美方CDC的同意之後，陳國東正式接手這項專案計畫。

老師的穿針引線，讓他一腳跨進公部門，不但從臨床跨界一頭栽進應用流行病學，也從此展開廿餘年的公衛生涯。

那是民國七十七年的時候，接下訓練班主任的位子之後，要帶領一群訓練班的醫師學生，可是光靠幾個醫師加上一個碩士主任，陳國東怕所學不足，因此再度動念想繼續充實自己，但申請政府公務人員進修，署長施純仁沒同意，擔心計畫才剛開始，會影響進度，因此要陳國東再等幾年。

一等等到民國八十一年，計畫已上軌道，適逢國防醫學院與中央研究院合作成立「生命科學研究所」，陳國東考進博士班，開始一面工作一面念書，取得博士學位。

這期間，衛生署組織重整，疾管局成立，陳國東即直接接手下出任疾管局疫情組組長，並繼續帶領主持訓練班計畫。

陳國東說，這個「應用流行病學專業人員訓練班」（FETP），目前全世界都有，會員約有四十個國家，臺灣算是創始會員國之一，一九八九年時美國希望把這個組織跟WTO結合在一起，以利全球疫情監控，所以當時FETP的宣言，就載明「未來不得以政



▲民國七十八年美國國際開發中心（AID）主任 Kenneth Bart 來台講學，與施純仁署長洽談，中為陳國東。



▲民國八十年流行病學第四期結訓，前排左一陳國東、左二葉金川，左三石曜堂，左四Dr.Malison，中為張博雅署長，右一台中榮總邵克勇院長，右四軍醫局李賢凱局長。



▲民國八十八年到美國參加會議並參觀紐約聯合國本部。

治理由排斥會員國」，因此這個國際組織的會籍，是中華民國自退出聯合國之後，我國家代表唯一可以在聯合國世界衛生組織中，正式與美、中同桌開會的場合。

當時明文載入，就是擔心中國會在一中下排斥我方會籍，只是沒想到有疑問的是印度，質疑

中國與中華民國的會員代表權，要算一席還是兩席？他當下據理力爭，「臺灣、中國問題讓我們自己處理，不要用政治來干預學術，這是要保障全人類健康的。」當時看來可能有點怪，事後證明這條宣言也蠻有用的。

陳國東認為，這件事讓他很有成就感，因為臺灣在沒有參與這個組織之前，很多疾病看起來很莫名其妙，也不會去追蹤，能和

國際接軌，對於疾病預防及國人健康保障倍增，「只是最近有以前同仁說，好像又看不到我們的名單了，政府已向大會提出抗議。」

流行病調查 公衛福爾摩斯

陳國東說，這個訓練班的工作，做的就像是所謂的「田野調查。」只要臺灣有傳染病疫情傳出，訓練班就會總動員展開調查，所以查疫行腳也是「凸」全臺灣。

例如民國八十四年，榮總院內爆發瘧疾感染案例，造成多人死亡，陳國東心想，瘧疾在一九六五年早已在臺灣根除，怎還會有這事發生？但經由傳統學術研究方法根本找不出病源，後來透過FETP組織協助及到院調查，一一訪視找出共通點再交叉比對，後來終於解開傳染之謎，原來是因為其中一人照電腦斷層打顯影劑時，院方只換了前一段管，卻沒換後段管，才造成院內感染，而這個病人曾到過奈及利亞。

民國八十八年宜蘭靖廬則是爆發四名大陸偷渡客集體死亡，當時還一度被國際人權組織控訴臺灣官員「苛扣官糧」虐待大陸偷渡客之污名，由於前一年民國八十七年臺灣首度爆發腸病毒，已讓宜蘭童玩節臨時喊卡損失達二億，這次發生偷渡客不明原因集體死亡，宜蘭縣政府擔心童玩節要再度喊停。

接到縣政府的求救電話之後，陳國東率隊前往靖廬。他說，一開始還真以為是否沒善待大陸偷渡客，結果柯源卿老師跟他說，日據時代臺灣曾流行腳氣病，當時臺灣



▲民國八十八年率隊前往宜蘭靖廬調查腳氣病。

有很多年輕人被選中要去當兵，感到很榮幸，因為上船後才有白米飯可吃，而船上吃最多的就是魚，「魚的維他命B1成分最少，白米又精緻。」大陸偷渡客原來在家鄉吃粗食，來到臺灣靖廬卻大魚大肉，所以可能是「吃太好」造成。

他說，當柯老師說，「這哪是沒善待，是吃太好」時，還想老師是不是老番顛了？且當地臨床醫師都說跟心臟有關；但抱著姑且一試，他說服了羅東聖母醫院，投藥測試，結果竟把已經發出病危通知的病人從鬼門關救回來，第二天已可拔管、正常呼吸，完全證實柯老師的推測是正確的，很戲劇性地以「腳氣病」結案。

但最具挑戰的，當屬SARS，「這一役，真的讓大家都上了一課。」陳國東說，SARS剛發生時，大家通通傻眼，這病沒見過，不只是臺灣不會，是全世界大家都不會。當時，衛生署喊出口號，可是流行傳染病無孔不入，SARS又有潛伏期，所謂「隔離檢疫」，在過去也都只是書本上的文字。



▲民國九十二年SARS總動員，與WHO派駐臺灣代表討論疫情，左一為許國雄副局長、左二為江英隆副局長，左三為陳國東。

雖然當時造成很多人犧牲，但事後，這卻是公衛的好教材，除了考驗專業，還有訓練防疫的正確態度。陳國東說，那時候SARS來勢洶洶，全世界還沒有人搞得清楚狀況，大家猜來猜去，後來犧牲的人當中，有不少是肺結核病人，可是肺結核病人不會這麼快死，因此研判有可能是併發造成，應是新病毒作怪，直到WTO找專家研究才得以解決。

SARS這一課，讓他更加體認防疫措施不容打折的重要性。「以前肺結核病人抓不到，通常會妥協，但像SARS就絕對不能手軟，該怎麼做就怎麼做。」而且檢疫關卡一定要做得確實，如果當初一開始防疫做得好，SARS就不會進到臺灣。



▲民國九十二年調任台北市性病防所所長，蘇益仁局長頒贈獎牌。

從流行病學到愛滋 踢到鐵板

但SARS一結束，陳國東也自覺江郎才盡了，當時台北市衛生局長張珩借重他的流行病學長才，請他擔任台北市性病防治所所長，衛生署前預醫研究所長洪其璧也勸進，「不要一直待在同一單位，何況這是首長的職位，不再只是主任。」但這回，他的人生又再次轉了彎，闖進了同性戀的世界。

陳國東說，和愛滋病患第一次接觸是在流行病學人員訓練班的時候，當年國內同性戀知名人士齊家威就帶他去逛同性戀聚集地，他對於為何會成為同性戀一直不能理解，齊家威反問他一句話，「你有沒有一個經驗，就是在高中時期，最親密的朋友都是男的？我們就是還停留在那個階段。」

防疫身經百戰，但在愛滋病防治卻成了十足的新手，剛開

始，陳國東把做流行病學那一套用在防治愛滋病上，結果搞到自己灰頭土臉。

「愛滋病，無法當做傳染病來處理，不論是想法、處理方式都大不相同。」他心想，當時有很多同志「轟趴」（Home Party），所以他就把那些同志團體找來，表示由性防所辦「轟趴」，然後安排衛教服務，在入口處做快速篩檢，有愛滋反應者就不要參加，或者分區參加。

陳國東保障同志健康的立意很高，可是卻讓同志團體大發雷霆，他才明白，這個領域是不能當傳染病來處理的，否則縱有滿腔熱血，也會被視為是歧視。陳國東苦笑說，著實硬生生地上了這一堂課。

不過，他不氣餒，對愛滋雖有專業知識，但仍需克服心理因素，後來他開始對同性戀及愛滋的領域進行初步研究。他認為，同性戀的思考模式、人生哲學都跟異性戀者不太一樣，「他們問我，轟趴你辦，但你敢不敢承擔一個後果，就是要有性行為、有藥物？因為沒這些，誰還會來呢？」

陳國東認為，國內未來應該要有專業研究才行，因為政府要做防疫策略，就必須要先做研究了解。他指出，國外有抗病毒藥，可降低病毒量，降低傳染力，但不應由健保給付，「沒有公衛目的，他們的治療就沒理由全民買單。」

人生再轉折 進入校園作育英才

到性防所一年左右，在成大教書的碩士班同學向他招手，建議他轉換跑道進學界，作育更多公衛人才，當下他沒有答應。但沒多久陳國東到英國開會，臺灣以發起人身分和其他國家一起籌組成立國際腦膜炎組織，但他職稱寫的是台北市性防所，被大會質疑兩者沒關連，「我感到專業被質疑了。」如果有學界的身

分，或許就不會如此受挫。

因此人生再次轉彎，走進校園。但身分轉換，也帶來不同的刺激。陳國東說，以前兼課、演講，二小時就結束，現在變成專任教職，一個題目可能做上好幾小時，「要教學、研究，就要深入，以前只要做到證明即可，現在是要做到反求證據才行。」

陳國東對於自己人生的轉彎，總能泰然以對，他說，行醫是一輩子的事，要當成專業來看，不論專長在哪一科，都要當做終身職業好好學習，「做好它，是你可以努力的；但財富能不能跟著你來，則是意外，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出身國醫的陳國東，雖已遠離軍醫體系，對於輔導會的連繫網絡建置相當讚賞，因為不論是碩士博士，一路以來都有人來連絡提供協助，畢業後到衛生署、到最近在國外開會，也都有人來連絡。但對軍醫院的體制變革，則有所建言，陳國東認為，軍中向來過度重視階級，把學術跟行政兩軌卡在一起，沒有行政經驗的資深教授當不了院長，最後都只能退役，造成學術上難以傳承。

他認為，國醫的學術風氣應改變，軍醫院沒有泰斗型人物，例如在各領域，大家講起指標性人物，幾乎都是台大、長庚、馬偕，就是不會有人提到三總，這是因為培育管道沒有強有力的支持，培養出可以走到頂端的人物。陳國東建議，國醫應更改制度，留下研究有成的資深人才，唯有走向學術路線，才能自我向上提升。【吳育玟／採訪整理】



▲二〇〇八年香港新興傳染病年會，前排右四為陳國東。